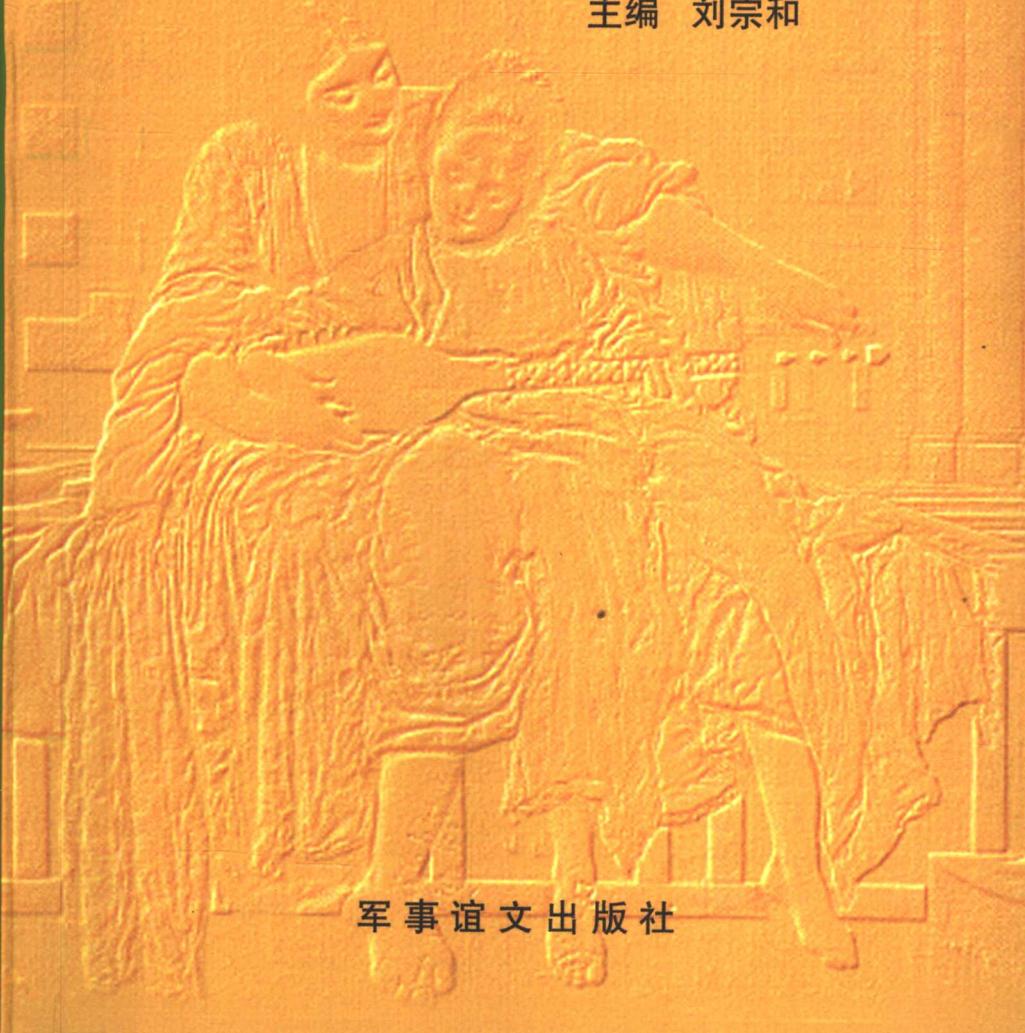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主编 刘宗和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

(第2辑)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刘宗和主编.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150—549—2

I. 国... II. 刘... III. 文化—研究—世界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318 号

书 名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

主 编 刘宗和

副 主 编 杜农一 王波

责 编 杜翔

出版发行 军事谊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6674723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8.3125

字 数 453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50—549—2/G · 87

定 价 37.00 元

E-mail:jsywcbs@126.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

主编 刘宗和

副主编 杜农一 王 波

编 委 何 树 杨淑华

李 静 葛腾飞

序

《国外文化研究论丛》第 I 辑是在 2003 年出版的。在过去两年，世界风云变幻，伟大祖国日益强大。不久前，“神六”升空，更是让每一位炎黄子孙为之振奋，也让世界更瞩目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度的人迫切需要加强彼此的沟通与了解，也敦促着每一位研究外国文化与政治的学者以更大的责任心和更强的使命感去承担文化桥梁的重要作用，帮助地球人消除彼此的偏见，尊重彼此的文化，加强彼此的沟通，促进彼此的交流与合作。

正是遵循着这些理念，我们始终不敢懈怠，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始终在不断地思考与耕耘。《国外文化研究论丛》第 II 辑终于又与大家见面了，它正是过去两年中我们许多专家、学者不停思考、不断耕耘的成果。与第 I 辑一样，我们这个论丛始终秉承“文化论坛、科研基地、学术园地、交流桥梁”的编辑宗旨，适时介绍国外文化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时准确报道国内外学术界的新思潮、新观点和新方法，力求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乃研究生提供一块分享学术研究心得体会和理论争鸣的园地，为加强文化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繁荣学术尽绵薄之力。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争鸣，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不断挑战。同时必须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把教学成果转化成科研成果，同时又让科研促进教学。因此，我们这里界定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文化。对于文化的定义，中外学者一直都争论不休。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俗称的大文化、小文化。从广义上说，文

化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潘绍中，《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我们认为，研究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对狭义文化的研究上，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地理和时间空间里，既研究抽象问题，也分析具体事物。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比较丰厚、充实、广泛，才能更好地深入理解和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与政治。这样的研究应该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它应该大到涉及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语言文字、文学作品，小到普通习俗、衣食住行等；它既可以追溯历史，也可以分析现状；既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

这样的外国文化研究与我们的外语教学息息相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可以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词语的文化内涵和系统的政治、历史、地理、社会、文学等社会文化知识，各民族与其他民族总有种种这些方面的差异，并在语言上反映出来，因此外语学习者必须系统学习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学社会等。所谓交际文化，指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语用知识。只有掌握语用知识，才能在交际中不引起偏差或误解。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两方面的知识都不可缺乏。因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学习外语的根本目的在于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操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际。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用外语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的能力（陆树明，“文化·语言·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顾嘉祖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因此，外国文化研究对我们外语教学的重要性毋庸讳言。

从事国际政治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也不例外。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现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的研究，因为只有这些深层次的文化

研究,才有助于我们真正把握和认识一个国家政治决策的根源所在。总之,我们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化,目的在于开拓学术视野,挖掘学术思路,繁荣学术园地,推陈出新,通过研究与探讨外国文化发展、演变的特征与规律,加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开拓,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并以此为参照,探讨我们自己文化发展的脉络与变化规律,更好地为外国语言文学和国际政治的教学与科研服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编委会

目 录

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角度看“意义协商”.....	潘承君(1)
韩礼德的语言哲学观	史正永(11)
专门用途英语的语言分析	洪艳青 李广才(21)
广告语篇中语类互文性的人际意义	朱洪涛(30)
广告英语词汇的文体分析	付满(44)
从认知角度看情态动词的多义性	罗凌云(53)
印地语实词的转类现象	秦庆兵(62)
构词理据和大学英语词汇教学	杨莉(82)
从我国外语教育现状看考试与教学的关系	姚峰(93)
大学低年级学生英语写作中的母语干扰	巫和雄(99)
任务型理论对写作教材评估的影响.....	韩秀荣(108)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泰汉翻译教程》的编写及体会.....	潘远洋(118)
ChinaMen 译本《金山华人》删改现象研究	金宝(123)
从“理解的历史性”原则看“误译”现象.....	巩军生(133)
试论英汉翻译过程中隐喻的处理问题.....	崔峰(141)
古典诗词翻译中双关语的处理及补偿手段.....	徐炜(149)
语域·语言功能·翻译操纵	李游子(159)
英译汉时句群信息的处理.....	王一多(169)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 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浅析其翻译观 韩宇(177)
隐喻及其理解和翻译 李凌云(183)

※※※※※※※※※※※※

- 叶芝在中国:与现代主义一同成长 步凡(189)
善与恶——霍桑作品中的儿童与医生形象 杨晓冬(205)
浅析福克纳小说中的《圣经》典故 庞绪(212)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蝴蝶梦》 李海霞(225)
斯特瑞塞:另一个詹姆斯 管炜(233)
吉姆之死的意义 李宏(239)
女性与河流

- 浅析乔治·爱略特作品中的女性角色 何静(245)
从霍桑笔下的女性角色看霍桑对女性态度的转变 张琳(255)
于形散处见神聚

- 由“突出”理论看具体诗的形式与内容 谢琳琳(263)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精神生态解析 李璐(276)
评《福赛特世家》中“房子”的象征意义 董薇(282)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情愫 李云玉(288)
论吉本芭娜娜的《厨房》 邹东来(299)
截然不同的两间屋

- 从《自己的一间屋》和《第19号房》看女性主义运动
..... 周艺(310)
悲剧英雄——撒旦和孙悟空艺术形象比较 李存颉(321)

珠儿寻父——从珠儿成长看霍桑的清教思想.....	黄津(327)
吉卜林对“帝国”的忧虑和修正.....	邱雷(336)
统一的三个“爸爸”意象	
——试析普拉斯的诗歌《爸爸》.....	陈丽颖(347)
哈贝马斯与芙蓉姐姐.....	郑志恒(353)
劳伦斯的诗歌.....	单泽(360)
《使节》中两种文化的拒绝融合.....	刘东亮(369)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	
——评凯特·肖班的《觉醒》中庞蒂里耶夫妇的生活观	
.....	孙全军(374)

※※※※※※※※※※※※

“文化冲突”和 WASP 的生存危机	谷蕾(380)
道德与法律的边界.....	盛红生(391)
健康广告中的评价体现的文化模式.....	施卫华(400)
美国妇女家庭角色历史变迁的社会文化考察.....	叶蕾(413)
论影响美国黑白混血儿种族身份的形成因素.....	余瑾(420)
英语中有关“死亡”的委婉语的文化解析.....	仝亚文(427)
世界最大的和平学系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学系.....	王波(435)
美国两党制形成原因探微.....	王军英(443)
新权力之路	
——浅析总统权力增强的原因.....	王帅(453)
由迪斯尼外族题材卡通电影“生产公式”看美国文化特性	

-
- 以《木兰》为个案 张铂(459)
 - 法国校园暴力初探 王萍(466)
 - 浅谈缅甸文化的佛教色彩 杨阳(476)

※※※※※※※※※※※※

- 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及其创新 崔建树(485)
- “欧亚大陆中心”的大棋局

 - 后苏联地区“颜色革命”解读 张文茹(497)
 - 试论俄罗斯军事改革的主要举措及经验启示 刘亚莉(506)
 - 困境与反思

 - 现行国际政治模式下的全球气候治理 葛汉文(515)
 - 反美主义的定义问题 胡二杰(525)
 - 冷战后美国软实力的下降及启示 肖欢(535)
 - 浅析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变 徐晨光(544)
 - 反恐背景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张轶骞(553)
 -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及其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高元新(563)

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角度看“意义协商”

潘承君

[内容提要] 当二语习得者的交流发生障碍时,他们可以求助于“意义协商”。“意义协商”不仅可以帮助解决交流故障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语言习得。本文从语言习得机制和心理学的角度对“意义协商”的作用作了一定的分析。

[关键词] 意义协商; 语言习得; 社会建构主义

1. 引言

上个世纪 70 年代前,二语习得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异同,语言习得的性质,母语迁移以及社会情感对二语习得的影响等。自 70 年代初开始,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日渐扩大,学习环境对习得的影响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语言输入,二是话语交流(Boulima, 1999)。Hatch(1978)认为句法结构是在话语交流中形成的。课堂教学中话语交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话语交流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分析目的语结构的契机,学习者在交流中检验他们对目的语所做的种种假设;(2)学习者在交流中可以利用“学习支援”(scaffolding),弥补自己二语水平的不足,同时又吸收到了新的语言知识,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输出新的语言知识,推动中介语(interlanguage)的发展;(3)学习者通过话语交流理解课堂活动(Boulima, 1999)。

自从人们开始接纳语言发展来自话语交流这一观点以来,大

量的研究开始把侧重点转向了二语习得的话语交流上。Krashen(1981)提出的输入假设引起了心理语言学家和二语习得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Krashen认为语言学习者必须要接触到稍微超过他们现有水平的可理解的语言($i+1$)，语言水平才能向前发展。与此同时，Long(1981)区分了调整后的话语输入(premodified input)和调整后的话语交流(interactionally modified input)。调整后的话语输入是针对学习者的，而调整后的话语交流则是对整个对话过程中话语结构的调整，比如运用理解检验(comprehension check)，要求解释(clarification requests)，话题转换(topic shifts)等来调整对话。Long认为在习得中，调整后的话语交流比简单的话语调整更重要：在简单的话语调整中，调整后的语言输入虽然明白易懂，但原有的新语言项目却被删除了，那么进一步的语言习得就受到了影响。同时，学习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原有语言输入虽然经过改动，却不一定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在调整后的话语交流中，学习者可以利用意义协商，自己把握调整语言输入的主动性，从而使语言输入更好地为自己的语言发展服务。Long进而指出意义协商作为一种语言输入的形式有助于推进二语习得。经过协商后的语言输入是可理解的，与学习者的语言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这样就比较容易被习得(Myles, Mitchell, 1998)。Long(1983)在Krashen的输入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交互假设”(Interaction Hypothesis)。

2. 从语言习得角度分析“意义协商”

Long(1983)界定了两种形式的“意义协商”，一是为了回避交谈出现问题而进行协商，二是当交谈出现问题后，为了修复谈话内容而进行协商。人们更倾向于将意义协商定位在第二种形式(Ellis, 1990)。Scarsella 和 Higa(1981)这样定义“意义协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交谈者互相合作以保证对话的进行并取得理解。正

如 Garfinkel(1967)指出的,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这里,我们描述这个过程中为了交流所做的工作,比如,互相帮助传达意思,弥补交谈中的空缺,指出理解上的差距,以及修复交流障碍。Varonis 和 Gass(1985)认为“意义协商”是为了澄清谈话双方的误解而做的努力。下面是“意义协商”的实例:

NS: A ceremony will be held on June 1st.

NNSUh, what will be held? Cere?

NS: A ceremony. A ceremony is a special event to
celebrate something.

NNSOh, I see. Ceremony.

Long(1981)认为,当二语习得者的交流发生障碍时,如果有机会进行意义协商,就能习得语言。Ellis(1990)将这一看法称作“交互假设”。Long(1983)正式提出“交互假设”模型:双向交流的任务中谈话双方进行意义协商,产出可理解的语言输入,从而促进语言习得。但话语交流和习得的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论证。Long(1985)认为间接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表明话语交流可以产生可理解的语言输入,第二步是推断出话语交流促进语言习得。意义协商能促进理解这一说法基本上已经确定(Ellis, 1995)。但理解是否进而促进习得就争议颇多了。Long(1981, 1983)在理解和习得的关系上只给出了间接的实证方面的证据来证明理解和习得的关系。从理论上说,Sharwood Smith(1986)认为理解和习得并不是同样的过程。Farch 和 Kasper(1986)指出理解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利用原有的知识来获得对文章的理解,这样一来,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就大大减少了,有可能会导致理解了文章,但却学而无获的结果,语言习得就无从谈起。理解也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过程。从单词,短语,句子,到整篇文章,从最小单元到最大单元的理解方式。这种方式的缺陷就在于缺少从总体上对文章的把握,

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不完整(Ellis, 1994)。但是,对于这一结论的否定又有悖常理。语言材料过难,学习者无法弄懂,无益于语言习得。Allwright 和 Bailey(1991)也认为并不是意义协商的结果,即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而是意义协商中所做的努力促进了语言习得。Ellis(1991)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交互假设:1)理解并不总是促进习得;2)只有当改动后的话语输入能引导学习者注意到话语输入中的新语言项目时,理解才促进习得。

第二,意义协商提供了一个练习的好机会,从语义分析转向句法分析(Swain, 1985)。Swain 强调输出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在 Swain(1985)一项法语浸透式教学的研究中,学习者有大量的可理解的输入,但很少有机会开口。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听力和书面理解的水平都很高,但输出的水平却差强人意,还会犯大量的语法错误。Swain 据此推测出语言输出在习得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在听和读中,学习者主要是弄明白组合在一起的语言形式的意义,即意义分析,而语言输出则更要求句法分析,句法分析是促进习得不可缺少的。Swain 强调只有推动的输出才能促进语言习得。一个叫 WES(Schmidt, 1983)的日本人在夏威夷生活了五年,虽然他的语法水平欠佳,他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虽然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的机会都有,但僵化现象还是出现了。因此,学习者必须要有推动的输出(pushed output),才能进步,否则,他可以换用其他方法来表达,但这对于习得是不利的,往往导致语言能力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意义协商可以推动学习者输出所需要的语言结构,促进语言习得。

第三,在意义协商中,意义和形式都兼顾到了。只关注意义或形式都不能保证语言学习的效果。以语言形式为纲的教学认为语言是一个个被分离的语言项目,只要在这些语言项目上做一些机械性的操练,就会形成语言习惯,也就等同于习得语言(Long & Robinson, 1998)。这种教学方式的主要问题就是将“输

入”等同于“吸收”。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知识是否全部能被转化为学习者内部的“吸收”呢？研究者认为学习者自身有内部大纲，任何外部强加的知识，不管出现多么频繁，都不能改变学习者总的语言发展(Ellis, 1994)。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强调外部因素，而忽视了学习者自身的需求。只有当语言输入符合学习者自身的内部大纲时，语言习得才能发生。另一方面，以意义为核心的教学方式也存在不足。学生接触大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然后自己从中总结语言规则，这就是以语意为核心所提倡的语言习得方式。在以学生为中心，以语言交际为教学目标的课堂教学中，教学的重点往往放在了语言技能的训练上，而忽视了语言的准确性，这是问题之一。其二，UG 究竟对二语习得是否起作用，争论不一。但是成人学外语的过程和儿童的母语习得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也就是说成人学外语不可能像儿童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习得，达到近似本族人的语言水平。由于缺乏语言环境而导致的语言输入量不足以成人与儿童不同的认知机制，UG 对二语习得的作用一直存在疑问(王文琴, 2003)。其三，就第二语言习得而言，有些语言项目的习得仅靠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不够的。“意义协商”中有很多的语言重复、改动后的说法等，而说话的双方对他们的意义都很清楚，只是一方不知道如何来表达。既然意义已经很明白，那么学习者就有更多的注意力来关注语言形式，促进语言吸收和习得。正如 Long(1996)指出的，学习者的选择性注意和不断发展的二语处理能力共同作用于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三者在意义协商中得到了最佳的利用效果。意义协商之所以促进二语习得是因为意义协商把语言输入，学习者的内部机制，尤其是选择性注意和输出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联系了起来。

3. 以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意义协商

以意义协商为基础的课堂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有截然不同

的区别。最常见的传统教学方式是 3Ps (Skehan, 1998): 展示 (Presentation), 操练 (Practice), 输出 (Production)。这种教学方式明显的缺陷就是违背了学生的语言发展途径。3Ps 的教学方式深受结构语言观的影响, 将整个语言系统分离成若干个语言项目, 认为语言习得就是一个直线型的发展过程, 学习者一次掌握一个语言项目, 日积月累, 就能掌握这门语言。但研究表明, 学习者往往要经历一个 U 型的发展过程。一开始似乎掌握了, 之后正确的和错误的形式反反复复出现, 这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Sato, 1990)。3Ps 设想学习者成功地习得一个语言项目, 接着下一个, 直到语言习得完成。这种设想是不科学的, 那么建立在这种设想基础上的 3Ps 就有问题了。Rutherford(1987)认为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性的前进过程, 而是循环的。还有一个问题是, 学生往往同时接触到多个语言项目, 考虑到学生的交流需求, 认知上的难度, 以及是否接近学生自身的大纲等因素, 即使假设语言项目是可以被一个个习得的, 那么它们是如何被内化的, 内化的顺序是否符合教授的顺序, 却不得而知。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3Ps 的教学方法未考虑到个体的心理机制。面对同样的教师, 同样的语言输入, 每个学生学到的知识是不尽相同的。他们总是把原有的知识经验带到新的学习中, 构建自己对新知识的理解。知识并不是简单的从教师传授给学生, 知识是在社会互动中意义的建构。所以, 硬要把知识强加给学生做法是无效的。个体学习者总是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带入学习中, 因此学习本质上是个人化、个别化的, 没有任何两个人会完全一样地学习。学习的目的是意义建构, 而不是机械地记忆一些现成的公式规则。语言习得是学生原有知识与新接触材料相互作用, 不断建构新语言体系的积极过程。同时, 学习是互动的过程, 是学生、教师、任务、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Williams&Burden, 1997)。社会建构主义认为, 教师应该为学生